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钱歌川散文选集



1266
58

百花散文书系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钱歌川散文选集

杜学忠 武在平 编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津〕新登字' (90) 002号

钱歌川散文选集

杜学忠 武在平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8 5/8 插页2 字数17600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7-5306-0867-3/I·780

定价: 5.45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言	杜学忠 (1)
最初的印象	(25)
飞霞妆	(31)
帝王遗物	(37)
闲中滋味	(43)
演戏之都	(51)
游牧遗风	(58)
北门锁钥	(65)
谈天	(71)
说穷	(74)
帽子哲学	(79)
一件长衫	(84)
谋事难	(89)
记齐白石	(95)
游荡者的辩解	(99)
洋场零语	(103)

吃鸡餐语	(109)
洋人崇拜	(115)
职业的诱惑	(121)
冬天的情调	(128)
前程	(133)
寡人有疾	(136)
两种不同的办法	(141)
初渡红海	(146)
水乡威尼斯	(150)
瑞士山水	(155)
欧洲的海上花园	(162)
斗牛之国	(167)
伦敦的俱乐部	(170)
国语的充实	(174)
写信的艺术	(179)
追怀伯鸿先生	(184)
悼学仪	(189)
我怎样学习英文的	(197)
读书的习惯	(204)
名山事业	(207)
巴山夜雨	(212)
风雨故人	(220)
大时代中的小事	(225)
偷青节	(231)
四川之竹	(235)
炸后巡礼	(239)

救命圈	(242)
说怕	(247)
蜡烛	(250)
鸡	(254)
战都零忆	(259)
我没有什么怪癖	(265)

序 言

杜学忠

在翻译界和外语教师中，钱歌川的名字大概是人所共知了。他翻译过多种英、美、日本作家的小说，出版过近百种关于翻译和学习英文的书，特别是他的《翻译的技巧》从七十年代问世以后，一时洛阳纸贵，多年来在台湾畅销不歇，在大陆也销行了五十多万部。一部学术著作在海峡两岸同时激起反响，恐怕并世无两。然而这一事业的成功并未给钱歌川带来多少欢乐，他说：“国内这一代的青年，把我看作一个专门贩卖洋货的人，使我很感到怅惘。他们心目中把我和英文等同起来，也是很不公平的。我一心只想恢复我固有的文人身份，多方努力只希望在国内能再版一部文集。”（《苦瓜散人自传》）所幸的是，钱歌川的愿望实现了：自1983年以来，北京友谊出版公司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四本散文集，1988年2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将他的二十多部、三百万言汇成皇皇巨帙《钱歌川文集》四卷付梓，为这位散文宿将矗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钱歌川，这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有着扎实而绵长的创作生命力的文学前辈，带着他的累累硕果又回

到读者中来了。

—

钱歌川，原名慕祖，自号苦瓜散人，又号次逊，笔名歌川，味椒，秦戈船。1903年生于湖南湘潭市郊的芷江，自幼喜欢诗文，深得塾师赞赏，又向塾师学习书法、治印，均有心得。1920年9月，负笈东游，先入日本东京东亚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及其它学科，1922年2月考入东京高师英文科，课余兼学音乐。1927年出版了第一部译作《娱妻记》（英国哈代著，开明书店出版）。1930年，经夏丏尊、丰子恺介绍，进上海中华书局做编辑，后又与周宪文、倪文宙合编《新中华》半月刊，从此活跃于文化界。1933年8月，与鲁迅、茅盾、田汉、邹韬奋等联名发表《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1935年6月，与叶圣陶、赵家璧等署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12月，与马良、蒋维乔、沈钧儒、钱基博等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钱歌川虽然早在1926年就在上海立达学园创办的刊物《一般》上发表过题为《誕生日》的短篇小说，但正式从事散文创作却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的。1932年，钱歌川参加一个学术团体赴北平开会，得以畅游故都，返沪后即将北游时的所见所闻写成随笔小品在《新中华》杂志上发表，1934年结成《北平夜话》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钱歌川以“味椒”的笔名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1935年出版了《詹詹集》，1936年出版了《流外集》，形成了钱歌川散文创作的第一个高潮。这两个集子的内容比《北平夜话》的视野更开

阔、题材更广泛，开掘更深刻，在艺术上，也初步形成了他的散淡苦涩的风格。

1936年6月，钱歌川与叶圣陶、茅盾、夏丏尊、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等联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表明了他对时局和文艺运动的态度。8月，在中华书局的支持和蔡元培的帮助下，钱歌川怀着江海之志再度扬帆，前往英国伦敦大学进修英国文学，在船上结识了费孝通、徐訏、潘家洵等人。他远涉重洋、游观沿途及欧洲各国，将见闻所得写成一本记游文字，名曰《观海集》。他以渊博的学识，灵透的眼光慧解异域的历史和情趣，洞察其风俗文化，欣赏其山川风光，将埃及的骆驼、大漠、金字塔；威尼斯的游船画舫“弓它拉”；古城旁匹哀的春宫秘戏、淫乐失度的遗迹；维苏威火山榴花似的血一般的滚滚岩浆；艺术之都罗马的教堂古墓，壁画雕像；但丁故乡翡冷翠的艺文人物；日内瓦碧冷冷的湖水，蒙勃朗、安纳西时时变幻、色彩纷呈的雪峰；欧洲海上花园葡萄牙的花坛喷泉、茂树繁枝；斗牛之国西班牙妇女盛装出游、招摇过市的奇观异俗，一一摄入自己的镜头。钱歌川的这些记游文字瑰奇壮丽，情文相生，熔知识性、趣味性、文学性于一炉，蔚成色彩斑斓的文章。

钱歌川赴欧不久，抗日战争即告爆发，全国上下，同仇敌忾。钱歌川抗战不敢后人，毅然放弃海外悠闲的生活，闯关返回祖国。归途中在新加坡短期逗留，与郁树银合编《南洋年鉴》，并参加华侨新闻工作。1939年8月，钱歌川前往四川乐山，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重新走上告别十年之久的讲坛。1942年夏，经王云槐介绍，转至重

庆英国新闻处主编中文刊物《世说》周刊，从事抗日宣传，同时兼任东吴、沪江、之江联合大学教席。其间除了教书，译书，编辑刊物，钱歌川依然坚持为《新中华》和刘英士主编的《星期评论》以及其它刊物撰写随笔小品。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编入重庆中华书局出版的《偷闲絮语》和《巴山随笔》，少数文章收入1948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游丝集》。抗战期间，巴蜀米珠薪桂，物价暴涨，钱歌川入不敷出，常靠借债度日，但他始终以积极乐观的态度与国人共渡时艰。在文学主张上，则提倡为抗战服务，认为“可以写日本兵的残暴行为，又可以写后方人士的抗战意识，以及许多与抗战有关的小事”，但反对空喊口号，主张以“事实去做题材”，“寓宣传于文学作品”，以期“收宣传之效于无形，使读者于不知不觉中受着我们的影响。”（《偷闲絮语·抗战宣传与文学》）钱歌川忠实地躬行这一主张，在他这一时期的散文随笔中，大都是通过对具体生活事件的叙写，反映抗战时期大后方人民所渡过的艰苦岁月，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偷青节》，便是一篇这样的文章。钱歌川这一时期的散文虽然多写苦难，但是字里行间跃动着昂扬的战斗情绪和深挚的爱国热情，并且将生动的叙述、割切的议论、郁烈的抒情融为一体，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散文艺术的社会功能和审美作用，这是他散文创作的第二个高潮。

1945年初，钱歌川参加了“友联社”，社员有朱世明等人。2月，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冰心等在重庆《新华日报》署名发表《文化界对时局进言》，敦促政府“及早实现民主”，“组织一战时全国一致政府”。

（该文由郭沫若执笔，后经修改编入《沸羹集》）8月，钱歌川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战胜利。1946年3月，朱世明担任了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以钱歌川谙熟英、日文，便请他做秘书主任，随团出川飞赴日本东京，参与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的工作。但因不耐案牍之苦，一俟创办任务完成后，便辞职回国，到南京教育部任学术审议委员会专门委员，主管全国英语教学工作。1947年春，应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之聘，前往台北创建文学院并任院长。钱歌川从1947年入台，到1964年离台，在台湾整整生活了十七年。在繁重的行政工作和教务之余，仍坚持笔耕，先后出版了《淡烟疏雨集》、《三台游赏录》、《虫灯缠梦录》、《竹头木屑集》、《狂瞽集》、《搔痒的乐趣》、《罕可集》等七八个集子，形成了他散文创作的第三个高潮。钱歌川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记述台湾的风俗文化，山川景物；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思想变迁；还写了许多知识小品、文艺散论和针砭时弊的杂文。

1964年6月24日，钱歌川怀着“何期垂老复投荒”，“秋风吹梦到南洋”的无限感伤和庆幸自己逃脱藩篱而又恋念家国的复杂心情，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前往新加坡应聘。先后到义安学院、新加坡大学、南洋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和翻译课。其间所写的一些游记、小品和文艺散论大都收在《秋风吹梦录》一书中。1972年底，钱歌川以七十高龄退出讲坛，移居美国纽约。钱歌川一生奉行三书主义：“教书、读书和著书”（《三书主义》）。退休后，不甘闲居，便以写作为正职，阅读为副业。十数年间，除有关英美语文及论翻译的著作外，小品随笔竟有《客边琐话》、

《篱下笔谈》、《瀛溟消闲录》、《浪迹烟波录》、《楚云沧海集》、《云容水态集》、《苦瓜散人自传》、《浮光掠影集》等八部文集付梓，形成了他散文创作的第四个高潮。钱歌川这一时期的作品，题材极广，数量极多，文字则任意走笔，无所顾忌。总要“写到畅所欲言，兴尽为止”（《楚云沧海集·行年八十》）。他侨居纽约十八年，却一直不肯在美国落籍，至死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1974年和1978年，他两次偕夫人回大陆探亲观光，第二次来时还应邀出席了国务院举行的国庆宴会，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和谐和温馨。1986年，钱歌川将自己辛劳一生的部分积蓄八千美元捐赠湖南大学作奖学金，支援祖国教育事业。1990年10月13日，钱歌川走完了他八十八年的人生历程，在纽约病逝。

二

我们要想比较准确地从总体上把握一个作家的主要倾向，必须把他放到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创作环境中去考察。钱歌川在三十年代开笔写散文小品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统治和文化“围剿”最为紧烈的时刻，特别是在当时政治文化中心的上海，更是犬多网密、文禁如毛。在白色恐怖和政治压力下，小品文领域里的分野和斗争也趋于明朗化。林语堂陆续创办了《论语》半月刊（1932）、《人间世》半月刊（1934）、《宇宙风》半月刊（1935），提倡“幽默”和“灵性”，主张小品文“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人间世·发刊词》）。并且认为小品文的写作“无关社会学

意识形态鸟事，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小品文遗绪》）。在他创办的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充满闲情逸致，或谈论琐碎掌故的小品随笔，掀起了一股小品文创作的热潮。但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反对林语堂等人的错误倾向，认为“《人间世》之类，则本是麻醉品”（1935年2月14日致吴渤信）；“专读《人间世》或《论语》一两年，而欲不变为废料，亦殊不可得”（1935年1月8日致郑振铎信）。鲁迅提倡战斗的小品文，说它“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小品文的危机》）。钱歌川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正是在“形形色色，新的旧的，右的左的，中的西的，都在各显神通”（钱歌川：《苦瓜散人自传》）的文化气氛中步入文坛的。既不属左翼，也不属右翼，既与林语堂保持友谊，认为林语堂给小品文注入了“一种新的生命”，“助长了小品文的成就”（《谈小品文》）；又与穆木天、冯乃超等左翼作家过从甚密，赞赏他们的普罗文章。钱歌川的这种立场和态度，必然要在他的创作题材和创作风格上或隐或显地反映出来。从他三十年代出版的《北平夜话》、《詹詹集》、《流外集》等书里的绝大部分篇章来看，他并不像林语堂、周作人等人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那样鼓吹闲情逸致，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没有写使人玩物丧志的东西，作品也不是“麻醉剂”和“小摆设”。从题材内容看，他的大部分散文反映现实、贴近生活，对于改善人间的弱点，矫正社会的陋习，补救世道人心，都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从文风上看，由于他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底，又精通两门外语，深受西洋文化浸染，所以他的文字从容博雅，

视野开阔，有学者气度，却又并不一味追求闲适、古趣或掉书袋。但是，从另一面讲，他对政治少有兴趣，也没能反映出尖锐的政治斗争、阶级矛盾，或时代的风云变幻。从他的作品里很难找到深入斗争漩涡或走进生活激流的题材内容。王礼锡希望他“成为一个中国的辛克莱”，但他“不是辛克莱的信徒”，未成为文字宣传的斗士（《纪念王礼锡》）。在文风上，也不像鲁迅那样老吏断狱般的深刻犀利，泼辣沉重，更缺少鲁迅那种指手斥敌的战斗风采和英姿。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作“夜话”，说自己的书里，“满纸都是些詹詹小言，真不足以当大雅一粲”（《詹詹集·序》）；说自己是“以闲人作闲话”，“人所不屑道者，我乐道之”，所以作品“既不入流，又不成品”，都是些“流外之作”（《流外集·小引》）。后来又说自己的短文“不三不四”，无非是一些“竹头木屑”（《竹头木屑集·后记》），“狂言瞽说”（《狂瞽集·自序》），“鸡头鱼刺”（《罕可集·自序》）。他还说自己写了几十年，没有写成一篇像样的“大作”，别人读了都好比“麻姑搔痒”，并希望读者“去从他这些废物中，找出它的用途来”，以备“尺寸之用”。就其散文创作的总体倾向而言，钱歌川的这些话，一半是自谦，一半是实情，也可以说是“如鱼在水，冷暖自知”的较为恳切的自评。钱歌川没有躲进象牙之塔，创作没有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没有忘怀现实，没有漠视人生，但是他也未能走向十字街头，深入劳苦大众，未能亲临荒波大海，去冒暴雨狂风，他是坐在避风港里听涛声拍岸，看海燕惊飞，在楼头窗口，看外面的世界，听窗下的市声，因而我们很难从他的作品里感受到惊心动魄

的雄伟力量，很难看到杀伐搏击的刀光剑影。

在钱歌川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写了七八百篇散文作品，要说篇篇精采，那自然是离实际过远，但施蛰存说他的文章“太杂，似乎离纯文学远了一些”（转见钱歌川：《故园东望路漫漫》），也未免冤枉了钱歌川。这个批评，用于他的部分作品是合适的，加之全体，则有失公平。钱歌川的不少散文随笔，不仅有较高的文学性，而且在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

第一，在他的散文里，洋溢着一种苦涩幽默的风韵。钱歌川喜欢幽默，而不赞成直接的嘲谑，认为“冷嘲热骂的文章，使人一读即知为冷嘲热骂，所以不免浅薄庸俗。唯有在字面上毫无嘲骂的痕迹，而骨子里实在是嘲骂，这才是最高明的写法。”（《秋风吹梦录·小品文写作技巧》）所以他主张“把悲剧去喜剧化”，去“苦中寻乐”（《悼学仪》）。这是他的美学追求，也和时代环境，本人性格，以及他的处世态度相关联。钱歌川是一个性格内向而又不乏幽默感的人，内心世界极为丰富，感觉非常灵敏，看得透一切世相，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鄙薄庸俗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但他又不愿直面挑战，不愿冷嘲热谑，更不想做文字狱的主角，所以便往往用笑来面对人生，用笑来映照社会的苦痛。不过他的笑，有时是苦笑，有时是强笑，却很少大笑和狂笑。有人评论说，钱歌川的文章，“内容博雅，文笔清畅，谈事无嬉笑怒骂，一览无余的犷态，恰如其笔名含义，如嚼橄榄，深有余味。”（转见《钱歌川文集·引言》）我们读他的散文，特别是三十年代的散文，确实也有同感。他的文字没有一泻千里的涛涛气势，

没有汹涌澎湃的湍湍急流，不是铜钟大吕，少作大气宏声，一文过目，也许并不觉得怎样精彩或感动，但静下心来，细细咀嚼，却能从中品出一股青果般的苦涩和清香。里面也有幽默，但不会使你捧腹，而只是令你会心的摇头苦笑。如《飞霞妆》，是写故都北平的风貌。文中说这里的风沙构成了这个故都的要素，北平若没有了风沙，正同日本人久不感到地震一样，人们就要觉得寂寞，觉得有些不够味儿：“每当风沙起时，北平人就发生一种亲密之感，洋车夫和苦力拿它当爽汗的扑粉，安步当车的穷教授嗅到表现艺术的土香。”作者说：“一个代表的中国人，一定能赏鉴北平的古香古色，一定能在灰尘中喝‘醉梅汤’，在大街口嚼‘硬面饽饽’，赞美‘当炉女’，反对‘女招待’，说到古物的保存，尤其要拥护古代传下来的风沙。”在这里，作者娓娓而谈，不动声色，只是叙述而不加评论，感情色彩也几乎淡到难以察觉。粗心的读者，还可能误以为作者是在赞美北平的风沙，其实，这是明褒暗贬，以恭维代责骂，细心的读者，会隐隐悟出这是嘲讽统治当局不修市政，收捐敛钱，却从不把钱用来改造自然环境，致使“古代传下来的风沙”绵延不绝，肆虐为虐，给市民带来不尽的苦难，而久居故都的百姓也已经习以为常，安之若素。全文荡漾着一种疏淡的情，苦涩的味，酸楚的笑，文思曲折而巧妙，确实有着别具一格的风韵。

例如《说穷》，揭露社会黑暗和当局迫害无辜。但文章并不直接切入本题，而是从社会上贫富不均写起，先说英国文人詹洛孟一条领带结过四天，就觉得穷得不得了，而作者自己一年理一次发，尚觉过奢，不意理发师竟赞美他是